

國民黨與共產黨對「反帝運動」的看法—以五卅運動 時期上海《民國日報》與《嚮導雜誌》為觀察對象

林嘉慧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通訊作者：林嘉慧

聯絡地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電子郵件：chialin@nkut.edu.tw

投稿日期：2011 年 5 月

接受日期：2011 年 9 月

摘 要

民國 14 年 5 月 30 日，上海學生為抗議日本紗廠於 5 月 15 日慘殺中國工人之暴行，舉行盛大之遊行講演，卻為南京路公共租界英國巡捕開槍射擊，造成死亡十一人，重傷二十餘人的慘劇。爾後，全國各地展開了罷工、罷市等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史稱「五卅運動」。五卅運動的展開，和當時處於幼年期的中國共產黨從中推波助瀾、乘時造勢頗有關聯。為了推動全面性的反帝，中共採取與資產階級結成聯合戰線的策略。雖然中共取得了工人和學生運動的領導權，但可明確的看出來，中共在「五卅」期間的活動是在國民黨的籠罩之下進行的，其成果因國民黨而有，也因國民黨而受限。而國民黨則因受聯俄容共政策的影響，由其民國 13 年改組後，工運落入共黨之手，以致共黨得以假國民黨之名從事工、農運動，發展自己的勢力。然而由於全國反帝聲浪高漲，國民黨也利用此次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從中取得反帝民族主義的領導權，為北伐革命做了重要的準備。本文透過從上海《民國日報》及《嚮導雜誌》的觀察，對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在五卅運動期間及其前後對「群眾運動」的態度轉變做一概略的描述，從中得知雙方在「第一次聯合戰線」上的合作與相互競爭情形。

關鍵詞：五卅運動、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民國日報、嚮導雜誌

壹、前言

1925 年 2 月，上海日商所開設的內外棉第八廠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全體罷工，其他各廠紛起響應，雖經調停，簽定協議，但因廠方背棄協議，任意開除工人代表，5 月又發生第二次工潮。5 月 15 日，內外棉第七廠工人亦加入罷工，日廠職員開槍，擊斃工人顧正洪，工人方面憤懣不平，內外棉其他各廠均起騷動。上海學生聞訊，激憤異常，於 5 月 30

日進入租界演講，不料租界捕房竟肆行逮捕。英捕頭愛伏生（Everson）更是下令中國籍和錫克（Sikh）巡捕向憤怒的人群開槍，當場斃命者四人，送往醫院不治者七人，受傷者十餘人，史稱「五卅慘案」。¹爾後更演為上海罷工、罷課、罷

¹ Harumi Goto-Shibata, *Japan and British in Shanghai, 1925-3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5), p15. 另參閱：李仕德，《北伐前後時期中英外交關係之研究 1925-1928》（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89）；偷之，〈五卅事件紀實〉，《東方雜誌五卅事件臨時增刊》，



市，且引起全國各地的響應，釀成聲勢龐大的反帝運動；日後稱整個事件的演變為「五卅運動」。

由於上海「五卅慘案」的發生，全國各地爆發劇烈的「民族運動」，於是漢口、沙基、重慶、南京等地相繼發生慘案，一時間民族主義意識甚為抬頭，全國陷入「打倒帝國主義」的洪流中。事實上，早在 1924 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已公開宣示「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心，而「五卅慘案」的爆發，使得當年 7 月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國民救國運動有所承，利用民氣大事宜傳「反帝」理念，因而吸引大批民眾的支持，帶動整個群眾運動，並促成 1926 年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統一，部分租界租借地之收回與關稅自主，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²

中國共產黨，亦利用五卅運動，透過群眾的力量壯大自己，由於當時國民黨同情農工的政策，故使得中共不僅使農工運動迅速發展，實際上成為國民黨地區內主導農工運動的政治力量。³在五卅運動前，中共只不過是一個黨員不到 1,000 人的小黨，然而，在經過五卅運動的發展後，短短不到一年之中，黨員人數就增加了十倍，迅速擴展到 11,000 人以上。⁴五卅運動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折點。

關於五卅事件與五卅運動的研究，多將視線投射於學生、工人、商人、執政政府（北京政府）身上，強調這些力量對運動的發起及推動作用，以及北京政府如何處理五卅運動時期的外交事件。而對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在「五卅運動」期間的相互合作與競爭比較忽略。偶爾有提到兩黨於五卅期間的表現，也多是流於雙方在五卅期間領導「反帝運動」而獲得如何的成果，或者僅對單一政黨的策略做研究。

⁵對於國共兩黨從民國 13 年合作的關係，在「五卅」期間彼

此之間有那些競爭與合作，甚至雙方於反帝運動中所著重的重點何在？則未見有任何的論著加以討論。這對於瞭解國共雙方在五卅運動期間的方向與策略，實有不足。

不過，仍有些學者在討論國共合作關係時會順帶提及雙方在五卅運動期間的合作與競爭關係。如郭恒鈺在其《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一書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利用「五卅」事件而起的第二階段罷工運動取得「領導者」的地位，並進而將工人運動擴大為民族運動，而從中取得了領導的地位。然該文主要的研討方向在於「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⁶而陳永發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提到，在五卅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如果利用「反帝」運動而擴大其民族主義聲勢，並且取得何種的最大利益。但對於國共雙方如何利用不同的策略或宣傳，並未加以論述。⁷

《民國日報》在《中央日報》發刊前為中國國民黨的機關宣傳刊物，反映國民黨的各項政策和主張，許多國民黨的核心人物皆曾在此報紙發表過看法與主張。因此，對於國民黨在北伐前的策略研究，《民國日報》不可不謂為重要資料之一；《嚮導》雜誌為中國共產黨創黨初期的發言雜誌，許多政策宣傳及主張亦都由此雜誌發聲，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羅章龍、張國燾都在此雜誌發表過重要宣言與文章。若欲瞭解共產黨初期的策略及主張上，《嚮導》雜誌是一份相當重要的史料。

本文即是針對五卅運動時期，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的策略、宣傳做分析。本文除前言、結論外，將以「五卅運動前」、「五卅運動中」及「沙基慘案發生後」三段時間加以觀察，從中希望能看出在五卅運動期間雙方如何利用策略及宣傳，在日漸高漲的民族反帝浪潮中取得其所要的領導地位。

貳、五卅前的國共合作與其策略

1924 年 1 月 31 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正式確立國民黨的外交政策，標示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國民黨改組之後，揭櫫反帝國主義的旗幟，國民革命乃進入一新的階段。⁸然而，此次大會也確立「聯俄容共」的政策。而國民黨與共產黨統一戰線組成後，國共之間有聯合亦有鬥爭。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的分裂狀態日趨明顯，甚至有部分右派份子因為成立一個西山會議俱樂部，⁹而遭到國民

第 22 卷；李達嘉，〈上海商人與五卅運動〉，《東方雜誌》，第 23 卷「五卅事件臨時增刊」，17 頁；李健民，〈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6），21-23 頁。

² 李守孔，〈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與國民救國運動〉，《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27）》（臺北：臺灣商務，1986 年），380 頁。

³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 修訂版），50-51 頁。

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58 頁。

⁵ 主要的相關研究有傅道慧，〈五卅運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任建樹、張銓，〈五卅運動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J Ugen Osterhammel 著、朱章才譯，〈中國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Elizabeth J. Perry 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曹力鐵，〈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9，第 3 期，269-275 頁；韓巍，〈試論中共領導“五卅”運動的策略〉，《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3 期，2001 年 6 月，99-102 頁；閻平，〈“五卅”運動和中共“左”傾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四

川師範大學學報》1995 年第 1 期，110-115 頁。

⁶ 郭恒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⁷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⁸ 王正華，〈國民政府之建立與初期成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47-148 頁。

⁹ 指的是 1925 年 3 月 8 日成立的中華民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除。掌握國民黨大部份權力的左派份子更是權力在握。然而左派份子當中的某些成員，對於與右派攤牌的作法並不贊成，事實上，他們指望能和右派當中某些人士及「新興資產階級」和解，認為這些人只是不理解孫中山先生的真正主張，並不是真正的政敵，甚至還希望將他們納入國民革命的軌道之中。¹⁰

當時國民黨對於廣東地區的控制並非完全穩固，且正處於東征時期，因此亟需要「粵商界一致擁護革命政府」。因此當楊希閔為了壯大勢力，更在廣州到處宣傳國民黨「赤化」、「共產」，國民黨還得向商界解釋國民政府的「非共產」，以釋狐疑。¹¹基於國民政府對於商人階級還有所需求之下，國民黨在推動群眾運動時，不得不顧慮到商人階層的感受，而有所顧忌。

改組後的國民黨工人部及農民部皆為共黨或左派所把持，對於日漸高漲的工農權益聲浪，不敢有所忽視而積極參與。從《國民日報》上，仍可以見到不少有關支持「工農運動」的報導。1925年2月，上海日商紗廠工人發動罷工，由此整個罷工風潮湧現，爾後的顧正洪案以及反對增定「印刷物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領照」等提案，在這幾項事件之中，國民黨也是積極參與。

1924年5月1日，國民黨機關報上海《國民日報》出「五一特刊」，報導大康紗廠廠主及管理人員對工人任意的污辱暴行。之後又連續刊登〈紗廠做工記〉等有關紗廠工人生活的文章，把工人的苦難生活以及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況公之於眾，訴諸於社會。1925年2月罷工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站在工人群眾一邊，《國民日報》對內外棉廠的罷工做了大量真實的報導，同情和支持工人的罷工。為了爭取社會的同情和支援，有些文章還開始把工人的罷工與民族鬥爭聯繫起來。2月17日《國民日報》〈日廠罷工與民族鬥爭〉一文指出，罷工的工人「民族鬥爭的色彩很濃厚，凡是中國

人都應該起來援助此次罷工的工人」¹²《國民日報》的主編邵力子，還因這些報導及登載日商各紗廠罷工工人〈泣告同胞書〉而受到租界當局以擾亂治安為罪名的審判。¹³

顧正洪事件發生後，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5月25日向全國發出援助上海紗工的通電，嚴重抗議日商在中國境內槍殺中國工人，「對於困苦無靠之工人的經濟要求，認為絕對正當，並擬設法予以援助」，並呼籲國人「一起奮起廢除外人藉以作惡之一切不平等條約如領事裁判、租界等」。¹⁴對於國民黨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宣言給予一個正面的呼應。針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提案」，國民黨也是提到國家主權與民族自尊心的高度加以激烈反對的。對這些「為工部局剝奪中國人民權利，墮落上海外僑人格之非法舉動，中國國民黨願與保護權利不甘亡國之國民，與主持公道自尊人格之外人共起力爭，以洗世界文明史之污點，以恢復中華民族之獨立平等地位。」¹⁵這些援助勞工運動及反帝的宣言，都無疑對五卅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國民黨與共產黨統一戰線組成後，國共之間有聯合亦有鬥爭。以「聯合」而言，國共兩黨都處於被動狀態；而以「鬥爭」來說，則有時是國民黨主動，有時是共產黨主動。就一般原則而言，國民黨只希望共產黨在國民黨的主義、組織和行動下行事，不希望共產黨擴展自身的勢力。共產黨願意在國民黨的旗幟下行事，是希望共產黨能隨國民黨的勢力擴展到全國。1923年6月中共三全大會決定：「我們加入國民黨，……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份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¹⁶也因如此，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行動，表面是以支持國民黨的國民運動，然而對於群眾運動則極力爭取領導地位。

中共認為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捲土重來，對中國的經濟破壞日趨加深，對中國各階層的壓迫日益加重。面對帝國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中國工人皆是不能忍受的。然而當時中共各地方的工會組織和共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力量，因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失敗而遭受打擊。到1924年5月，中共在上海只有47名黨員，其中工人黨員只有8名。由於工人組織，「除了幾種手工業有幾個行會外，只有一大批的招牌工會，此外即有一、二個工會組織，還是提倡什

部，參加者有馮自由、馬素和其他國民黨內右翼代表。鮑羅庭針對孫中山逝世後的國民黨所作的書面報告上所言，這些人是全中國最保守、最落後、反革命的一幫人。裡面的成員有買辦、軍閥的餘孽、腰纏萬貫的基督徒、維護紳劣豪反對農民的衛道人士、幾個反對中國實行階級鬥爭的教授，還有一些死抱住農村自然經濟和農村落後生活方式不放的人，再就是一些有奶便是娘的知識份子。在一些新興份子逐步掌握運動領導權之時，國民黨的反動份子對這些人恨之入骨，更想迫使他們分裂而去。同年3月26日，遭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除出黨。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1卷（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490頁。

¹⁰ 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1卷，491頁。

¹¹ 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37頁。

¹² 〈日廠罷工與民族鬥爭〉，上海《國民日報》，民國14年2月17日。

¹³ 曹力鐵，〈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270頁。

¹⁴ 〈國民黨援助上海紗工宣言〉，上海《國民日報》，民國14年5月28日。

¹⁵ 〈中國國民黨反對上海租界工部局三提案之宣言〉，上海《國民日報》，民國14年6月1日。

¹⁶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二版），160頁。



麼勞資妥協的」。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還是處於「零」的階段。¹⁷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後改變國民黨的黨內狀態。俄共領導認為孫中山先生的去世具有深遠後果的重大政治事件，是使國民黨政策更為激進的一個契機，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其群眾運動的領導的一個機會。¹⁸基於政治與經濟連帶關係，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通過《工會運動問題決議案》，明確指示：「工會的責任是發展會員的階級意識，擴大他們的眼界，使日常的鬥爭問題，都和工人最切身的利益連結起來」、「這樣的日常鬥爭問題，應發展而且能發展成爲總的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中共在其「四大」以後加強對上海工運工作的領導，於是沒多久就出現上海日商紗廠的「二月罷工」。

罷工事件發生後，在上海，隨即有罷工委員會的組織用以延續罷工運動，由鄭中夏、李立三負責，號召上海黨員全力以赴，發動日商紗廠工人罷工，提出罷工鬥爭的綱領，¹⁹製作傳單發給各廠工人，吸引工人，鼓勵工人起來鬥爭。到2月中旬，大罷工蔓延到22家日本紗廠，有四萬多名工人投入罷工活動。在中共的精心策劃和上海人民的支援下，罷工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18天，迫使日本資本家坐下來與工人談判，承認工人提出的一些條件，罷工取得勝利。

在這期間，加強中共在工人當中的領導力，將積極份子吸收成爲黨員。且積極的鞏固和發展工會組織，僅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小紗渡的工會會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楊樹浦增加到三千人」，日商紗廠的工會組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秘密到公開迅速發展。中共還注意啓發工人的政治覺醒，提出「反對東洋人打人」諸如此類的通俗口號，激發工人階級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大大推動上海工人運動的發展，也爲發展政治民族運動作了準備。

5月15日，當七廠工人進廠交涉時，卻遭到廠方的鎮壓，日本紗廠資方開槍殺中國工人顧正洪等人，再一次激起了大規模的工人抗爭。在顧正洪被毆致死事件爆發後，由中共所主導的上海大學的跨黨學生就在國民黨的通力合作下，將整個抗議活動擴大爲「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共黨員李立三、劉少奇則把握時機成立上海總工會，發動全面罷工和罷市。²⁰

內外棉各廠工人憤起罷工，並且成立罷工委員會，提出改善工人權益的八項條件，²¹而在5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指示：「我們在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應該號召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運動。」²²雖然罷工性質屬於經濟抗爭，卻由中共所主導的上海大學的跨黨學生就在國民黨的通力合作下，將整個抗議活動擴大爲「反帝國主義」運動。

5月22日，一萬多工人衝破巡捕的阻撓參加內外紗棉廠工會舉辦公祭顧正洪大會。說明上海工人通過前一個時期的經濟罷工運動已經受到中共宣傳的影響，逐漸成爲中共領導群眾進行反帝運動的一股力量。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召開聯席會議，反覆討論後認爲上海的反帝潮流日益高漲，並呈現匯合之勢，只要宣傳鼓動，就可能把工人的罷工鬥爭擴大到全民族的反帝鬥爭。蔡和森提出：「應當把工人的經濟鬥爭轉到民族鬥爭」，「把工人的經濟鬥爭與目前正在蓬勃發展的反帝鬥爭匯合起來，要使工人表現明顯的反帝性質，以爭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時就使工人加入總的反帝戰線而成爲這一戰線的中間。」²³

中共的這一決策是把整個運動推向高潮的關鍵。在這樣決策的指導下，中共首先發動學生上街演講、遊行、聲援罷工工人。不料，英國巡捕竟然向遊行的學生開槍，製造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而驚動整個中國。

參、五卅運動時期國共的策略

前已述及，國民黨在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後的主要策略，對內是軍事和財政的統一，對外致力於對抗軍閥以及帝國主義，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及租界爲其主要目標。然而在五卅慘案發生後，國民黨面對怒不可遏的「群眾運動」也不敢輕忽。6月1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即以中國國民黨的名義發表宣言，對五卅事件表明愛國的立場和態度。宣言憤怒的譴責英國巡捕悍然槍殺赤手空拳的愛國學生和工人的暴行，表示：「中國國民黨願助全中國之愛國愛平等自由之民眾，對此慘無人道行爲及其代表之武力侵略政策，以全力奮鬥，俾

¹⁷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203頁。

¹⁸ 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1卷，448頁。

¹⁹ 1. 以後日本人不准打人；2. 增加工資兩成；3. 第八廠辭退的工人需完全復工；4. 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5. 罷工期內工資照付，以後職工非犯通姦鬥毆等事者，不得無故開除。

²⁰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179頁。

²¹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563頁。內容爲：(一) 開除並依法懲辦肇禍的東洋人—元木川村；(二) 賠償傷亡工友的損失並撫卹其家屬；(三) 以後各東洋人及其用人不准攜帶武器；(四) 恢復被開除工友原有之工作；(五) 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之全；(六) 罷工期間薪水照常發給；(七) 分贈賞銀不准取消；(八) 工錢賞錢須一律照大洋發給不得折扣。

²²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334頁。

²³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140頁。



張人權，恢復國威」。²⁴

此外，上海各界咸以身受暴力的壓迫，非以全民的力量起而抗爭，不足以保持國家尊嚴，乃進一步發動全市罷工、罷課、罷市，風潮益為擴大。北京學生亦於慘案翌日奮起響應，紛紛罷課，以為後援。其影響及於全國，並擴大為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運動。²⁵6月3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與廣東省農會、總商會、工會一同聲援上海學生及工人，主張要求收回租界、領事裁判權及會審公廨等。如北京段祺瑞政府不能力爭，則全國將展開罷工、罷市、罷課等運動。²⁶

當時一些著名的國民黨人更是挺身而出，積極地參加這一場反帝活動。于右任在慘案發生後，即對英巡捕的暴行進行譴責，支持群眾的正義抗爭。²⁷更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當時他正在歐洲，聞訊後，義憤填膺，積極向歐洲各國宣傳慘案的真相，並用英德法三國文字在歐洲各報上發表宣言，認為五卅事件的遠因是不平等條約，中國喪失主權；近因是日本資本家苛待華工和英國巡捕慘殺人民，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另外，為了援助罷工工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專門組織五卅事件失業工人救濟會。6月19日，國民黨海外部通電海外各支部，要求募大批款項援助上海罷工工人。各地華僑共捐款200多萬元，從經濟上大力支援五卅運動。²⁸

從上述事實得知，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態度是明朗的，行動是積極的。當時，共產黨在上海和全國並沒有合法地位，在社會上的政治影響也還有限；國民黨的這種態度和行動，無疑對發動群眾運動起了很大作用。而國民黨主要方向仍以第一次黨大會所做的宣言為主軸，將風起雲湧的全國群眾運動提高至反帝的位階之上。在五卅運動中，國民黨堅持廢除不平等條約，力主把運動推向全國，支持人民鬥爭的言論和行動。這與當時虞洽卿等人與上海總商會主張將抗議範圍縮小，避免在擴大風潮，靜候解決，勿生枝節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國民黨對外策略的重心仍在「反帝」，為強調「反對帝國主義」的決心，在6月5日的《民國日報》上發表〈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對五卅事件第二次宣言〉，強調國民黨黨綱及歷次宣言皆反對帝國主義，與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民族獨

立國際平等。²⁹因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更宣言「應取消中國與英、日締結之一切不平等條約為賠償此次死傷、污辱與損失之最低代價，在未達到目的以前，舉國實行與英、日經濟絕交」。³⁰並認為在未達目的之前，不應受「排外」、「赤外」影響，且「五卅」運動是華人同德同心的運動，尤其是學生以外各界，確已能認識自己對於國家的責任。³¹6月7日，胡漢民以廣東革命政府名義發表宣言，認為「不當僅注意道歉懲辦無卹等枝節問題，尤當以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著手，以謀根本解決。」³²

6月4日，《民國日報》在第一版發表言論〈這只是上海的事嗎？〉，批駁那些企圖對運動進行限制的人，認為這場鬥爭「是中華民國國權人格上一件大事，絕不僅限於上海一隅。」³³可見當時國民黨企圖將「五卅運動」提高至全體國民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的位階。

在加強一般民眾對於帝國主義的瞭解及避免使共產主義因而抬頭，國民黨在《民國日報》上發表一篇〈帝國主義之真義與誤解〉文章，強調近世的帝國主義，稱之為經濟的帝國主義。其不同於以前之帝國主義者，在於政治武力侵略之外尤注重經濟侵略。而認為反對帝國主義即為主張共產，亦不是國民黨所認同的。在國人之愛國行動或有和平激烈之分，最低限度之主張，應保存中國之民族獨立與國際平等，反對任何國之強權與經濟侵略。³⁴

除了不斷的提出「孫中山」的名號以鞏固國民黨居於革命領導地位外，為了讓「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更為擴大，國民黨在《民國日報》發表〈孫中山夫人之談話〉，文中認為：「……學生工人與市民之愛國運動中，處處可見孫先生之精神，為民族爭獨立，為民權爭保障」、「上海人民以至罷市罷工，所爭者，為保障人權擁護國威及爭自由獨立平等之中華民國。」、「國民黨認為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宜分對內對外。對外當以言論喚起世界各國之人民主張公道，對內當一方團結各界，堅持到底，同時大規模向自省募捐款項，援助失業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時喚起全國人之民族精神，為長時期之

²⁴ 〈中國國民黨對「五卅」事件宣言〉，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3日。

²⁵ 傅啓學，《中國外交史》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382-384頁；〈「五卅」怒潮已瀰漫於全國〉，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3日。

²⁶ 〈萬方齊湧之「五卅」怒潮〉，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4日。

²⁷ 〈于右任論五卅事件〉，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9日。

²⁸ 曹力鐵，〈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271-272頁。

²⁹ 〈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對五卅事件第二次宣言〉，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5日。

³⁰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輯，《革命文獻》第18輯，5頁。

³¹ 〈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對五卅事件第二次宣言〉，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5日；〈宣布此次慘案於世界〉，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6日。

³² 〈代大元帥胡漢民對上海五卅慘案發表宣言，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宣言」，第14號，23-24頁。

³³ 〈這只是上海的事嗎？〉，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4日。

³⁴ 〈帝國主義之真義與誤解〉，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8日。



奮鬥，務達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之目的。」³⁵

6月7日，北京政府的特派員到達上海，企圖「調解」這場事件。針對他們和總商會的默契，《民國日報》在他們到達的第二天起，就連續發表文章，痛快淋漓地揭露他們出賣人民，屈服於帝國主義的真相。³⁶並且日後持續號召群眾「快點起來，不要給他們三誤四誤，牽累到國家民族啊！」³⁷

6月10日，梁啟超在北京《晨報》發表〈我們應該怎樣對付上海慘殺事件〉，公開主張「專對上海英捕房」，反對進行三罷運動。緊接著，丁文江又在該報發表〈高調與責任〉，污衊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為不負責任的高調。針對這樣的言論，楊杏佛為《民國日報》撰寫〈駁梁任公應付上海慘殺案態度〉一文，揭露梁、丁以和事佬自居，極調和息爭之能事，嚴正宣告：「我們這次認定不平等條約是我們民族獨立的障礙，誓以全民眾的全力消除這兩大障礙，是「五卅」為民族獨立運動的精神。」³⁸就此不斷的提升「五卅」的位階，將整個運動定位於「爭民族獨立運動」，並且是由國民黨領導全體國民共同爭取。國民黨並對外發表「五卅事件」發生之日，正是革命政府決定戡定內亂之時，決定先戡定內亂後，再全力對外，而這一切都廣州革命政府的愛國愛民的苦心表現。並說明戡亂是遵守孫先生遺囑的工作，等到叛亂評定之後，自然會負起為國家求獨立為民族求自由的全部責任。³⁹

6月中旬，正當群眾的鬥爭進入高潮時，虞洽卿等人成立總商會五卅慘案委員會，與共產黨主持的五卅運動的總領導機關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分庭抗禮，企圖爭奪領導權。總商會修改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條交涉條件，取消有關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條款，希望儘早與英日帝國主義談和，恢復到五卅前的原狀。因此，堅持工商學聯合會的17條或是接受總商會的13條，堅持「三罷」運動或是單獨開市，就成五卅反帝統一戰線中的爭執焦點。在這個爭執中，國民黨是堅持自己的立場，在《民國日報》發表言論，指斥虞洽卿等人貪便宜、圖僥倖，是在商言商，認為「總商會所提出的13條，當然不能代表總商會以外的一切人的意思」；「工商學聯合會是『五卅』事件中，上海民眾的總集合，他們對『五卅』案負有重

大的責任，他們自有相當的權能，罷工與開工，罷市與開市——需徵求工商學聯合會的同意。」⁴⁰另外，6月19日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所在地廣州又發生「沙基慘案」，促使因五卅事件觸發的反帝運動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省港大罷工。在省港大罷工中，國民黨不僅反帝的態度更堅決，且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對罷工的領導。

國民黨也不是完全沒有反對的聲浪，戴季陶就有保留和不同意見。在五卅運動期間，提出所謂「戴季陶主義」要「單獨對英」，但不是參與虞洽卿等人的活動。這些思想和觀點沒有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或上海執行部所接受。⁴¹

總之，國民黨無論是對五卅運動的醞釀、發動和發展都發揮重要作用。而國共之間「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第一次實現於實際行動」基本上是成功的。雖然國民黨的基本外交方針仍以「反帝國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主，並且試圖利用「群眾運動」擴大自己反帝的聲勢，但若沒有中共領導群眾運動的配合，或許成效沒有那樣明顯。沒有這一聯合戰線，沒有國共合作這一政治基礎，就不可能有上海各界人民在五卅形成的反帝統一戰線和全國的革命熱潮。

在中國共產黨方面，「五卅慘案」發生後，中共看到不可擋的反帝情緒高漲，為了進一步的將群眾組織起來，進行強而有力的反帝運動，中共中央當晚隨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此次運動擴大到各階級去，結成各階級聯合陣線，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一致向帝國主義進攻。」經過一連串的努力，6月1日，上海實現了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的「三罷」抗爭。同時，為了統一行動，成立上海總工會、全國學運、上海學運、總商聯合組成的運動統一領導機構——「工商學聯合會」，表明「五卅」運動到達高潮。⁴²

共產黨在《嚮導》雜誌上發表的意見中，表明國共的反帝國主義態度，並利用工人的運動擴大成為民族主義全國運動。〈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一文中可知，共產黨認為五卅事件以後中國的歷史已經開始一個新時期——實行國民革命的時期。五卅後反帝國主義運動已進行革命行動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共產黨認為已經不是宣傳上的口號，而是群眾鬥爭的實際目標。⁴³因此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工人的力量〉與〈1923年之27與1925年之27〉兩篇文章中，共產黨更指出「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若沒有工人階級有力的參加奮鬥，決沒有得

³⁵ 〈孫中山夫人之談話〉，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9日。

³⁶ 〈告「大員」〉，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8日；〈交涉進行尚無頭緒〉，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13日。

³⁷ 〈外交失敗的端倪〉，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15日。

³⁸ 〈駁梁任公應付上海慘殺案態度〉，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14日。

³⁹ 〈戡亂後的革命政府必有以慰為國奮鬥的民眾〉，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16日。

⁴⁰ 〈駁斥虞洽卿之演說〉，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14日。

⁴¹ 曹力鐵，〈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274頁。

⁴² 韓巍，〈試論中共領導“五卅”運動的策略〉，99頁。

⁴³ 〈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嚮導》第125期，1146頁。



到勝利的可能。中國的工人階級處於軍閥制度及帝國主義的兩重壓迫之下，不但是階級的階級鬥爭而且還是中國民族鬥爭裡的先鋒。⁴⁴五卅以前，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未能集中，這次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是工人階級所引導的，全國人民之所以奮起與外國帝國主義者抗爭，提出要求條件，也是全靠工人階級做後盾，而且各階級實際上共同的聯合戰線也漸漸的鞏固起來，聯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分子，繼續在共產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旗幟下，達到完全解放中國及工人階級的目的。⁴⁵如此的宣傳，可以看出共產黨在整個五卅慘案後，其企圖將整個群眾力量擴大為工人階級的群眾抗爭的意圖，並從中取得其領導的角色。

共產黨趁勢將整個運動擴大成為全面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其針對的國家不單單只有日本、英國，甚至擴及整個「資本主義國家」。在〈日本紗廠工潮中之觀察〉提出：「以前認為單獨仇視日本是錯誤，現在要知道一切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民族的意圖是一致的。」⁴⁶而在〈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更提出：「若主張針對英日或專對英國是錯誤的，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犯罪行為，而不能制裁國家的橫暴與民族之間的衝突，所以抗爭的方法，不可依賴法律，亦不可依賴政府，惟有依賴國民自己的團結力。」⁴⁷另外在〈大屠殺中上海報紙的論調〉及〈帝國主義屠殺上海市民的經過〉文中認為：「五卅慘案的屠殺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英捕房槍殺學生及市民，他們不當作是帝國主義國家壓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以維持他的『侵掠秩序』看待，只當作是英捕房偶然與學生發生感情的衝突或工部局處理不當，致演此慘劇；因中國工人無辜被殺，引起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遂被國際帝國主義所重視，故英國帝國主義者決以嚴厲手段禁止學生在租界上做反帝國主義的宣傳，結果竟至拘捕並槍殺中國學生，從此愈演愈烈，共產黨也認為美國也加入其列強陣線中。」⁴⁸如此的言論宣傳，除了使得「反帝」的宣傳更加火熱外，亦正好滿足共產黨反「資本帝國主義」的思想宣傳。

罷工、罷市行為，卻受到當時在上海租界的列強們以「受共產黨籍蘇聯的煽動」攻擊。為了避免「赤化」使得整個群

眾運動受到阻礙，也為了上海總工會能夠在整個罷工、罷市運動中持續處於領導的位置，因此共產黨在《嚮導》雜誌上發表一連串的聲明。在〈帝國主義的傭僕與中國平民〉一文中指出：「日本居然異口同聲的說紗廠罷工是共產黨的煽動所致。若是赤化就是革命（中國的民族革命），是爭中國的解放獨立，使外國資本家不能奴役中國人，這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眼裡看來，這便是赤化。否認罷工是單純排日，一定要張大其辭說罷工是排外運動，社會主義的反對資本制度的運動，日本人這種手段不但要使怯弱的中國資產階級中立，而且要暗示英美帝國主義：中國工人排日的結果，便是排斥一切外國侵略及資本制度。英美的帝國主義者亦恐慌起來，大宣傳其罷工工人赤化，並受蘇聯的金錢煽動等的謾言。」⁴⁹這裡對列強們將群眾的反對帝國主義運動被「赤化」的宣傳，予以強烈的反駁。

就在共產黨在「五卅」運動深入發展的同時，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內部卻出現「懲兇賠償」、「縮小戰線」、「法律解決」等主張，企圖影響群眾，模糊反帝運動的目標，分裂群眾運動的力量。6月6日，中共中央發表《告民眾書》，指出「這次上海事變的性質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應認定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為其主要目的。」⁵⁰向各界群眾說明中共對英、日等國的反帝運動的方向，更不認同將民族運動切割為多個解決方法，而是全國一致對外。

綜觀五卅運動期間，雖然共黨領導群眾的力量相當積極，但國民黨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中，國民黨的主要敵人是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執政北洋軍閥。為了打倒他們，國民黨必須充分發揮反帝的一面，爭取人民的支持，加強自己的政治實力，否則就會失去自己的政治號召力。因此國民黨在當時的形勢，不斷的附和共黨「群眾運動」的作法，不放棄反帝旗幟。這是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能積極發揮作用，堅持反帝的一個重要原因。

共產黨主張「無產」階級的革命，在五卅事件爆發後，全國不斷高起主張「民族主義」情緒，使得中共不得不修改其經濟群眾運動的作為，將整個運動位階提高到全國性的「反帝」運動。然而實際上中共仍以農工經濟運動為其主要的作法，而在國民黨反帝旗幟之下，擴充其群眾運動領導者能力，而成為群眾運動中的一股強大勢力。

肆、沙基慘案後國共策略的轉變

⁴⁴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工人的力量〉，《嚮導》第 101 期，845 頁；〈1923 年之 27 與 1925 年之 27〉，《嚮導》第 101 期，845 頁。

⁴⁵ 〈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嚮導》第 125 期，1147-1148 頁。

⁴⁶ 〈日本紗廠工潮中之觀察〉，《嚮導》第 117 期，1079 頁。

⁴⁷ 〈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嚮導》第 118 期，1087 頁。

⁴⁸ 〈大屠殺中上海報紙的論調〉，《嚮導》第 117 期，1080-1081 頁；〈帝國主義屠殺上海市民的經過〉，《嚮導》第 117 期，1082 頁。

⁴⁹ 〈帝國主義的傭僕與中國平民〉，《嚮導》第 104 期，869 頁。

⁵⁰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203 頁。



五卅運動變成全國性的民族反帝運動後，各地列強軍警槍殺示威中國學生、工人頻頻發生，而就在6月23日，廣州發生「沙基慘案」，參加示威的當地大、中學生及黃埔軍校學生，竟遭到防護沙面的英、法軍以機槍掃射，死傷一百餘人。⁵¹有人認為沙基事件對於廣州革命政府實有警告的意味，在各列強的強大軍事壓力下，廣州政府在偏處廣州一隅的情勢下，很明顯地，狂熱群眾運動的外交行動，實難有何等迴旋的餘地。所以，在蘇俄顧問鮑羅廷(Michael Borodin)的勸告下，國民黨軍並未採取激烈的報復性行動，將整個「反帝」運動只側重口頭宣傳與和平的經濟絕交為止。⁵²

「沙基慘案」發生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目標轉向對內的軍閥，希望先安內後攘外。「國民此時唯一一致督責北京臨時執政，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條約，仿照前年(1924)中俄協定之例，另與各國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國民黨在《民國日報》提出「在其沙基事件中，是因廣州各界為援助滬案遊行，首當交涉之衝的是革命政府。滬案、漢案以及粵案，只是一案、只是一個運動—就是民族的自由獨立運動。革命政府是代表桎梏中全國民眾的政府，不是單代表廣東的政府，全國人民所爭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民族的獨立問題。」⁵³並且從而指責北京政府的反應過於軟弱，痛罵北京政府將一個滬案交涉由廢除不平等條約為目的的一切條件，硬要分作直接、間接兩段。認為滬案在北京交涉，漢口，九江等案就地交涉，這無異將全中國的一個外交案支解開來。應該依照孫中山先生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還中國民族的獨立自由來解決問題。⁵⁴

國民黨認為弱國無外交，而北京外交當局懦弱。北京政府竟然採取二重外交，國人主張的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北京政府卻向國人先減次價，將「廢除」兩字竄改成「修改」兩字。滬案交涉，原是工商學聯合會所提的17條，一辦內交，被改為總商會主張的13條；經過幾次甚麼非正式接洽，且將13條也給腰斬支解；當時是希望對內由國民自主改革政治，對外利用列強的互相排擠。以產生如土耳其一般成為獨立自主的新共和國。而北京一方主張單獨對英，一方主張兼對英日。⁵⁵

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十天後，國民

政府外交部長胡漢民即專為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發表〈告世界各國人民書〉，其中云：「不平等條約存在的一天，中國絕不能使國家澄清，因此，我們要求我們的國際地位，此後應改為與其他各國平等之地位。...能有使主權之獨立，這包括著(外人)治外法權、經濟特權的廢除。這是屬於單方面的。我們要求修訂海關稅則，使中國能為發展其經濟起見，採取必要的經濟政策。我們要求收回我們自己房屋的鑰匙。」⁵⁶

在國民黨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以後，於《民國日報》中〈國民黨訓練全國黨員〉指出：「段祺瑞對於北京外交團，旋有修正不平等條約之要求，提出善後會議國民代表會議這與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絕非同物。」⁵⁷而政府理應對付帝國主義，聯合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一致以抵抗帝國主義。文章認為中國歷年之亂狀，實在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利用北洋軍閥為工具，而北洋軍閥又以南方敗類軍閥為工具，因而造成國家的不安。⁵⁸

這樣的一個嚴正但又緩和的反帝政策，使得國民黨得到廣東革命基地和各地人民的擁護，國民黨員人數也因而急速增加。國民黨在1921年左右之黨員人數約數萬人，且多數為追隨孫中山先生當年的志士，然至1926年底時，其黨員人數遽增至廿五萬人之多。⁵⁹而廣州政府，對於事件行動，不只同情而且極力直接支持，堅持對英的罷工抵制和不合作。並且極力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全國民眾的所以甘願協助，是因為瞭解國民政府的內政外交，在打倒軍閥，及軍閥所依附的帝國主義，符合國家民族的需求。南北兩政府，因為在五卅事件後的政治表現不同，引起全國民眾對兩政府好、惡不同的心理，和擁護打倒的抉擇。民眾的抉擇，在短短的兩三年內，為促成北京政府的崩潰和國民革命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而在共產黨方面，從6月底開始，「五卅」反帝運動出現了不利的形勢。首先是資產階級妥協和退出反帝聯合戰線。上海的買辦資產階級早在運動初期就準備對帝國主義妥協。總商會以「此次英人屠殺，凡屬同胞，誰不發旨？但各走極端，勢必弄成僵局，本會今日之不加入，即為將來調和之餘地」為理由，⁶⁰拒絕參加工商學聯合會。在工人和學生的壓力下參加聯合會候，又提出反英不反日「縮小範圍」的主張，藉以混亂抗爭目標，讓中小資產階級也發生動搖，並

⁵¹ 《革命文獻》第十八輯，333-3758頁。

⁵² 李恩涵，〈北伐期間收回漢口、九江英國租借的交涉〉，收錄在《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第二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117頁。

⁵³ 〈沙基大慘案的性質〉，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6月26日。

⁵⁴ 〈將整個的外交案尸解腰斬了〉，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7月6日。

⁵⁵ 〈二重外交〉，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7月18日。

⁵⁶ 《革命文獻》第十八輯，130-134頁。

⁵⁷ 〈國民黨訓練全國黨員〉，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7月23日。

⁵⁸ 〈國民政府招待報界〉，上海《民國日報》，民國14年7月23日。

⁵⁹ 李恩涵，〈北伐期間收回漢口、九江英國租借的交涉〉，118頁。

⁶⁰ 韓巍，〈試論中共領導“五卅”運動的策略〉，101頁。



於 6 月 26 日強行開市。在工部局提供電力後，資產階級信心產生動搖，不僅不再支持罷工，反而強迫工人復工。

基於上述的發展，共產黨在〈帝國主義的傭僕與中國平民〉一文中即對商人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角色提出質疑，「共產黨一直強調民族運動是世界革命運動中重要的原動力，是破壞帝國主義的重要要素。從 1925 年 2 月的大罷工，為中華民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大表現。不僅有民族運動的意義，實有反抗資本專制的資方階級鬥爭的意義，然而中國買辦階級的發展，使中國的民族運動遇見很大的障礙」。⁶¹

其次是運動中最活躍的一個階級——青年學生，「因其家庭地位各有不同，到了一定的條件下必然會發生分化」。⁶²在資產階級提出「縮小範圍」主張後，學生內部便分裂成左右兩派。加上放暑假的關係，學生紛紛回家，學生聯合會的力量遁形削弱。

總商會沒有履行「抵制英日貨物」及「援助停業工人」的宣言，反而幫著帝國主義者來破壞工會，因此中共主張徹底推翻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關稅自主，撤退外國駐華的一切武裝勢力，才是根本解決之道。⁶³並要求民眾更加要推翻軍閥和商閥，要力爭國民會議，建立真正統一的代表全國民眾利益的政府。然而廣州國民政府受工農群眾的贊助，戰勝反動軍閥（陳炯明、滇桂軍）。因此共產黨「民眾聯合戰線」是持續五卅愛國運動繼續反奉戰爭，是拯救目前中國危機之唯一的辦法。且國民黨的右派在《民國日報》上發表主張民眾聯合戰線，共產黨期望他們真能實現他們的主張，真正與全國民眾來合作。

在五卅運動發生之前，共產黨即在《嚮導》發表〈英美日衝突加緊與中國政局〉一文，認為遠東英美日是主要的侵掠競爭者。英美的利用直系的曹錕、吳佩孚和日本的利用皖系與奉系的段祺瑞、張作霖，證明國內軍閥的戰爭是與帝國主義列強的在華勢力是有絕大影響的。⁶⁴

帝國主義者援助軍閥是他們對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慣用的政策，扶植舊勢力，抑制新勢力，俾永遠在他們支配之下。段祺瑞包辦善後會議的本意主要作用只在藉此來欺騙人民阻止人民自動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軍閥制度的改革運動。⁶⁵

般認為，在五卅之前，奉系軍閥已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在青島已殘殺不少中國工人。五卅之後，奉系軍閥更進一步而再受英國帝國主義之委託，奉系軍閥和英日帝國主義共同向民眾進攻的「大事業」。⁶⁶因此《嚮導》雜誌大力宣傳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使人們對當時軍閥混戰的複雜形勢有明確的認識，懂得帝國主義各國是各派軍閥的後臺老板，要打倒軍閥統一中國則必須打倒帝國主義。

雖然說五卅運動爆發後，使得蘇聯積極的插手中國的事務，然而路線卻做了改變，他們認為軍事力量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決定因素，而工農、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群眾運動只是輔助作用。因此相較於給予廣州先武器供應的經費，蘇共政治局給批准上海罷工的經費可以說是微乎其微。⁶⁷加上資產階級的退出罷工行動和學生聯合會力量的削弱，反帝聯合戰線幾乎解體。只剩下二十多萬罷工工人孤軍奮戰。到 8 月初，各地接濟罷工工人的捐款已發放殆盡，資產階級接濟工人的生活費的諾言也未兌現，使得堅持罷工鬥爭的工人，連同他們妻兒老小約 100 萬人陷入飢餓狀態，工人處境日益艱難。在這種狀況下，中共必須即時改變其鬥爭的策略，引導群眾逐步收縮，得以保存實力，以為往後的運動做好準備。⁶⁸

就在運動陷入低潮之時，中共內部也產生意見分歧。上海有一部分黨員和工人積極份子想發動武裝暴動，把反帝運動推向新階段。中共中央召開會議，分析當時的客觀形勢後，認為：「不應該在群眾起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作一種浪漫的拼命辦法，想藉此洩憤，或拿來替代現實困難的鬥爭。」否定武裝暴動的意見，決定收縮反帝運動。就在此時，國際共黨也訓令：「要保持實力，應由政治鬥爭轉到經濟鬥爭和部分的經濟要求。」⁶⁹於是，1925 年 8 月 10 日，黨發表《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為堅持罷工告工人兵士學生書》，指出上海香港的罷工運動引起全國解放運動的發展，然而現在這一潮流，還不能立刻形成全國的反抗運動；工人還必須有長期鬥爭的準備，而且，軍閥一天天地逼近，甚至於大資產階級已經想中止罷工及抵貨運動；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孤

605-607 頁；〈被壓迫者的自由與赤化〉，《嚮導》第 102 期，860 頁。

66 〈五卅屠殺後之奉系軍閥〉，《嚮導》第 120 期，1105-1107 頁。

67 據 1925 年 6-8 月的資料，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名義轉寄上海的，為 20 萬盧布，而從 4 月至 10 月提供廣州的武器價值為 460 萬盧布。1925-1926 預算中的軍事供應，按計畫竟達到 1 千 1 百萬盧布。與此數額相比，共產國際方面資助中共的預算就微乎其微了。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一卷，447 頁。

68 韓巍，〈試論中共領導“五卅”運動的策略〉，101 頁。

69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68 頁。

61 〈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工人〉，《嚮導》第 104 期，866-867 頁；〈帝國主義的傭僕與中國平民〉，《嚮導》第 104 期，869 頁。

62 韓巍，〈試論中共領導“五卅”運動的策略〉，101 頁。

63 〈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嚮導》第 125 期，1145 頁；〈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嚮導》第 125 期，11-47 頁；〈滬案重查與五卅屠殺的結局(？)〉，《嚮導》第 137 期，1249 頁。

64 〈英美日衝突加緊與中國政局〉，《嚮導》第 95 期，803 頁。

65 〈帝國主義者援助軍閥之又一證據〉，《嚮導》第 76 期，



軍獨進，也不足以使帝國主義者立即拋棄不平等條約。「因此上海工人現時應當明白表示，對於自身的經濟上及法律上的要求，當然繼續以罷工方法力爭；至於全國的總要求和工商學各界所提出的條件，工人當以全力贊助南北政府，一致的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奮鬥」。⁷⁰於此，充分的解釋中共轉變策略的必要性。

根據上述精神，李立三、劉少奇等領導多次召開各工會代表會議，由上海總工會發表《五卅罷工最低復工宣言》，⁷¹根據宣言磋商各業工人的具體復工條件，向工人闡明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係，以及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指出復工的必要性，成功地領導了工人復工。從8月下旬開始，上海二十多萬罷工工人分批、分期地復工。首先是日本紗廠，經過談判確定復工的條件後，於8月25日復工。此後，海員、工部局、英廠工人經過談判，取得一定的經濟權益後，也相繼復工。⁷²

伍、結論

自從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民族運動一直在中國內部醞釀，但不同階層有著不同訴求，工人階層因社會地位低、經濟力弱，傾向以罷工示威來達其目標。這也是共產黨成立後注意此階層的動力並加以運用。士紳商人則因經濟利益因素與國內政治無法穩定，因此需在租界獲得帝國主義的庇護，對民族運動常採妥協態度，如上海總商會對五卅事件之態度。然而，南北政府在此五卅事件發生的20年代，呈現出不同走向。北洋政府在直系與奉系聯手時，有英日帝國主義者為背後支持，對五卅訴求民族運動，採取修約外交及和平手段以解決問題。廣州政府因其勢力在南方又採聯俄容共政策，促成共產黨與國民黨在這一時期合作，運用工農力量統一南方，得到全國注視這一個政體，也隨著北伐，英日美帝國主義者，轉向與此政權交涉。

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聯俄容共」促成共產黨與國民黨在表面上必須聯合對外。尤其在大會結束後，「反帝國主義」更是國民黨所高舉出來的口號。同年10月，孫中山先生北上與張作霖、段祺瑞共商國事時，途經

上海發表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言論，大大鼓舞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民。當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後，國民黨即利用這股民氣，不斷的將整個活動提高至全體國民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而在「沙基慘案」發生後，國民黨更企圖從中取得「反對帝國主義」的領導地位，因此不管是在對付其他政治領導人物—梁啟超、軍閥或者北京政府方面的批評，更是不餘遺力，尤其在對北京政府及軍閥的批評上，更是指軍閥及對外代表中國的北京政府是「帝國主義」者的傀儡。相反的，在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對於五卅事件運動，不只同情而且極力直接支持，堅持對英的罷工抵制和不合作。且極力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爾後，國民政府逐漸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乃是因為瞭解國民政府的內政外交，在打倒軍閥，及軍閥所依附的帝國主義，符合國家民族的需求。南北兩政府，因為在五卅事件後的政治表現不同，引起全國民眾對兩政府好惡不同的心理，和擁護打倒的抉擇。民眾的抉擇，在短短的兩三年內，便促成北京政府的崩潰和國民革命的成功。

中國共產黨在1924年國民黨施行「聯俄容共」後，即在三方面大體上是國民黨聯合的：一為農工運動，此事大體由共產黨主導；二為反帝國主義運動，此事由兩黨共同推動；三為接受孫中山的遺囑，這一方面由國民黨主導。⁷³五卅運動展開時，共產黨在表面上是遵從此一方式進行，但事實上，我們可以從《嚮導》看到在對五卅運動的態度上，國共之間的鬥爭比聯合還多。運動發生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以中國國民黨的名義，憤怒地譴責英國巡捕悍然槍殺赤手空拳的愛國學生與工人時，由共產黨所主導的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則主張縮小抗爭的上海總商會展開鬥爭。而在民族革命運動方面，共產黨更認為不是由孫中山個人的理想所造出來的，乃是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形勢逼出來的。並且在農工運動方面不斷的打擊國民黨，而從中取得領導地位。事實上，在五卅運動展開沒多久，共產黨即試圖滲透國民黨，在五卅慘案爆發隔日，《嚮導》即有文章詆諆當時國民政府代理大元帥胡漢民向楊希閔、劉鎮寰等軍閥妥協的報導出現。⁷⁴雖然說國民黨已經有所防備，而且也適時提出反駁，⁷⁵但還是無法阻止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分化作用。汪兆銘、廖仲愷等親共的國民黨員，不斷的積極爭取共產黨效力國民革命。而共產黨卻也適時的把握機會，不斷的打擊國民政府及國民黨，而從中取得民族革命及農工運動的領導權力。

⁷⁰ 〈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告工人兵士學生〉，《嚮導》第125期，10頁。

⁷¹ 提出：一、無條件交回上海會審公堂；二、租界內出版、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三、租界華人須與外人有同等參政權利；四、承認工人有自由組織工會之權，並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之全；五、工人一體上工，不得因此次罷工開除工人；六、發給罷工期工資之百分之五十；七、增加工資百分之五十，工資一律給大洋；八、優待工人，尤須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條件；九、賠償死傷學生、工人等九條復工條件

⁷² 韓巍，〈試論中共領導“五卅”運動的策略〉，102頁。

⁷³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160頁。

⁷⁴ 〈形式嚴重下之廣州政府〉，《嚮導》118期，1093-1094頁。

⁷⁵ 〈代大元帥胡漢民發表關共產謠言宣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命令，第14號，37頁。



總之，國民黨無論是對五卅運動的醞釀、發動和發展都發揮一定作用，尤其在反對帝國主義運動方面。瞿秋白認為是「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第一次實現於實際行動」，⁷⁶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是成功的，沒有這一聯合戰線，沒有國共合作這一基礎，就不可能有上海各界人民在五卅形成的反帝統一戰線和全國的革命熱潮。當然，國民黨在五卅運動所起的作用與共產黨的影響和推動是分不開的。除了運動的指導思想、政治口號和行動方針都是共產黨提出的以外，還有許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部做了不少工作，如當時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傳部、婦女部的領導工作就分別由惲代英、向警予主持，五卅運動的主體和中間力量也是直接領導的工人群眾。所以整個運動的領導權還是共產黨掌握的。⁷⁷

儘管如此，國民黨也並非是完全被動的，其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政治格局中，國民黨的主要敵人是受到帝國主義支持執政的北洋軍閥，為了打倒他們，國民黨必須充分發揮反帝的一面，爭取人民的支持，加強自己的政治實力，否則就會失去自己的政治號召力，因此國民黨在「五卅運動」期間，高舉的「反帝」的旗幟，還是發揮相當的效用，獲得許多國民的認同，而累積許多日後北伐的力量。

綜觀上面所述，國民黨在 1924 年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後，即以「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其往後革命的目標，因此當五卅運動展開後，國民黨遵從此一方向，在《國民日報》上不斷的宣傳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對於「反帝、廢約」的看法及作為，並從中取得領導的地位，而為往後的北伐取得良好的地位與機會。然而「聯俄容共」後，中國共產黨卻得以在國民黨內日漸壯大，並從而分裂國民黨，從《嚮導》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在表面上與國民黨合作，實質上卻不斷的分裂國民黨、打擊國民黨。雖然國民黨已做出適時的反應，但卻因為分裂而使得成效有限，因而使得共產黨不僅日漸擴大，甚至取的農工運動的領導地位，而為日後的北伐種下難以磨滅的危險因子。

參考文獻

一、原史檔案

《民國日報》 民國 14 年 2 月-12 月
《嚮導》 101 期-196 期

二、參考文獻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81）。**五卅運動史料**（第一

卷）。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央檔案館（198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北京市：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王正華（1986）。**國民政府之建立與初期成就**。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任建樹、張銓（1985）。**五卅運動簡史**。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仕德（1989）。**北代前後時期中英外交關係之研究（1925-1928）**。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班。

李守孔（1986）。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與國民救國運動。載於中華文化復興推動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27 輯，379-436 頁）。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李健民（1986）。**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張玉法（2001）。**中華民國史稿**（二版）。台北市：聯經出版社。

陳永發（2001）。**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市：聯經出版社。

郭恒鈺（1989）。**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

傅道慧（1985）。**五卅運動**。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

曹力鐵（1989）。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3 期，269-275 頁。

馮筱才（2004）。**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閻平（1995）。五卅運動和中共左傾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 期，110-115 頁。

韓巍（2001）。試論中共領導“五卅”運動的策略。**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0 卷 3 期，99-102 頁。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一卷）（Comintern and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Vol. 1.1920-1925）（1997）。（李玉貞譯）。台北市：聯經出版社。（原著於 1994 年莫斯科俄文版）

Harumi, G. S. (1995). *Japan and British in Shanghai, 1925-3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Osterhammel, J. (2000). **中國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朱章才）。台北市：麥田出版公司。（原著於 1997 年出版）。

⁷⁶ 瞿秋白，《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五卅運動史料》第 1 卷，118 頁。

⁷⁷ 曹力鐵，〈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274-275 頁。



The Perspective of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toward Anti-Imperialistic Movement —Observed from Min-Guo Daily and Guide Magazine during May 30 Movement

Chia-Hui Li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esign,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On 30th of May 1925, students in Shanghai undertook a big demonstration, protes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workers being killed by a Japanese cotton manufactory on 15th of May that year. This movement however ended with 11 death and more than 20 badly injured shot by British police force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 in Nanking road. In response to this incident, strikes and anti-imperialistic movements were brought about nationwide. It is called the “ May 30 Movement”. In fact, the May 30 Movement is related to the ai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hich was still young at that time and was willing to take the chance.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overall anti-imperialistic movements, CCP applies the strategy of fighting together with the Capitalists. Though CCP had taken charge of the workers and students movements, their activities during May 30 Movement were still carried on under KMT’s (the Nationalist Party) supervision. Because of KMT, they enjoyed the success resulted from the movements, but also felt restrained by it. However, owing to the “cooperate with the Soviet Union, tolerat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olicy, KMT was forced to undergo a reformation in 1924, which allowed CCP to take over the command of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s. On one hand, CCP had, in the name of KMT, used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movements to strengthen its own power. But, on account of the upsurge of the anti-imperialism, KMT had also made a good use of the high-pitched nationalism to take over the command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ic mov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Northern Punitive Expedition”. With a survey of Shanghai “Min-Guo Daily” and “Guide ”magazine, this work described KMT’s and CCP’s shift in attitude during May 30 Movement and mass movem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parties, 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upon their “first united combat”.

Keywords: Kuomintang, Communist Party, May 30th Event, Min-Guo Daily, Guide Magazine

